

导 论

中国小说流派纷呈，从题材而言，便有历史演义、侠义公案等等之分。世情小说乃是这众多流派中很重要的一个流派。所谓世情，实际是世态人情的简称，而世情小说则是指那些主要以普通男女的生活琐事、饮食大欲、恋爱婚姻、家庭人伦关系、家庭或家族兴衰以及社会各阶层众生相等为题材，来反映社会现实（所谓“世相”）的小说。具体地说，世情小说应该是记人事者一类中“讲史”、“公案”、“英雄传奇”、“公案侠义”之外的所有其他小说的总称，它包括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列入“人情”、“讽刺”、“谴责”、“狭邪”等篇目中的诸种小说在内（鲁迅先生的小说分类存在着标准不一的问题）。

除了题材的不同，世情小说在艺术上也颇有些与其他小说不同的特质：从故事情节而言，它不像历史演义、英雄传奇、侠义公案、神魔灵怪等小说那样，以“奇”和“曲”为基调，靠“奇”和“曲”取胜，它虽也讲究情节的曲折、波澜，但作为这曲折基础的首先是“真”，是以“真”取胜；从作品风格来说，它不像英雄传奇、侠义公案、神魔灵怪小说那样多显得雄浑豪壮，如大江大河汹涌澎湃，它叙写的多是平凡的人生，一般没有那些惊天动地的大事，也较少所谓丰功伟业，作品多像溪流小湖，虽不无波澜，但较少那种大开大阖，而是体现出俊逸细腻的特点；从形象塑造来说，它也不像历史演义、侠义公案、神魔灵怪小说那样多采用粗线条勾勒的方法，轻造型而特重传神写意，世情小说虽也有某种程度的轻造型重写意的倾向，但更多的却是较细致的描绘，层面也更为复杂丰富；从小说反映的“个人性”和“社会性”而言，它则不像历史演义、侠义公案、神魔灵怪小说那样

“个人性”多从属于政治性、伦理性，或曰其“个人性”更多地体现于“社会性”中，人物形象中呈现出来的共性较多，世情小说中的人物，“个人性”中则明显地有较多的“自然性”，体现为一种政治、伦理性和人的“本能性”的胶着融合，而个性化的色彩也明显浓烈。

这本小书，便将按照上述这种定义和范围去描述中国古代世情小说发生、发展乃至衰微的历史，并力图较为准确地确立世情小说中一些重要作家作品在整个世情小说乃至整个中国小说坐标系中的位置，发掘出世情小说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联系，以及它和其他题材小说，和其他的文艺样式，特别是和戏曲发展之间的关系等，以期较为明晰地勾勒出世情小说发展的线索，揭示出它发展中一些较为重要的规律。

第一章 从孕育到萌生

中国小说源头遥远，可以上溯到上古的传说、神话和巫卜。一些准小说的出现，审慎一点说，至迟也是战国时的事。明代胡应麟就说过《穆天子传》“颇为小说滥觞”，又说《汲冢琐语》“盖古今纪异之祖”，“《山海经》，古今语怪之祖”^①。这三种著作之出，一般认为在战国期间。到汉代，小说一体正式形成，出现了像《列仙传》、《神异经》一类的志怪小说和像《燕丹子》一类的辑轶小说。至魏晋则已蔚为大观了，出现了《搜神记》、《幽明录》、《世说新语》那样的志怪、辑轶名作。但世情小说萌生的时代却要晚得多，一直要到空前强盛的唐代才出现。不过唐前志怪和辑轶小说之中，有时又不能不存有世情小说的因子。正是在这些因子之中，孕育着后来十分发达的世情小说的胚胎。

第一节 唐以前志怪小说中的“世情”因子

志怪小说的世界，确实是神灵鬼怪的世界，然而这神怪世界，却正是现实世界光线的折射，故无论作者是如何地着意营造神怪世界，也不可能彻底脱却世情世相。

汉有《神异经》，旧谓东方朔作。东方朔作云云自系“假托”^②，但书出于汉，则似无疑义。东汉人服虔便已见过此书^③。那《神异经·东南荒经》中有如下则：

东南隅大荒之中，有朴父焉。夫妇并高千里，腹围自辅。天初立时，使其夫妻导开百川，懒不用意。谪之并立东南，男露其势，女露其牝，不饮不食，不畏寒暑，唯饮天露。须黄河清，当复使其夫妇导护百川……

所谓“懒不用意。谪之并立东南，男露其势，女露其牝”，显然在暗示朴父是因贪恋情欲而有亏职守才遭此惩罚的，若除去其神话色彩，则完全可敷衍成一个世情故事。此外，《神异经·中荒经》里的西王母登希有鸟之背与东王公相会，以及玉女投壶的故事，显然也是世俗社会的生活折射。

汉又有《列仙传》，葛洪等以为刘向作^④。断为刘向作，也缺乏证据，但东汉末王逸《楚辞·天问》注及应劭《汉书音义》都曾引《列仙传》，断其出于汉则肯定会有错。而《列仙传》中所记载的“仙”，绝大多数是曾经生活在世界上的真实的人，像老子、吕尚、范蠡、东方朔等，都是人的仙化和世俗生活的神化。其中负局先生的悬壶济世、为世人治病除灾，园客的种桑养蚕获妻，均为世俗社会生活的反映。特别是《江妃二女传》和《萧史》两篇，世情的色彩便更见浓重。江妃二女与郑交甫相逢于江汉之湄，诗歌答问，解珮相赠，依然有无限情恋，完全是一则世俗男女一见钟情的恋爱故事。唯“趋去数十步，视，空怀无珮，顾二女，忽然不见”数语，方点出二女为神，露出淡淡的仙气来。《萧史》一则叙秦穆公女弄玉恋上了善吹箫的萧史，结为夫妻。公为作凤台居之。“一旦皆随凤凰飞去。”萧史、弄玉，本皆世俗社会的人，尤其是萧史似乎还是个平民，他和弄玉的相悦成婚，完全是以箫为媒介，这已经很有后世爱情小说的因素了。

当然，在汉代的志怪小说中，世俗生活的描述，是极其简单的，有些甚至没有情节，描述的重点还只在于一个“异”字。这从上面介绍的人化的恋欲之神以及人神的情爱、恩爱夫妇的仙去都可以看出。这些故事虽有世俗的内容，实际上不着人间烟火，并无世俗生活的气息，或是世俗生活气息甚少。

迨及魏晋南北朝，具有世俗内容的志怪小说，便明显地有了发展。魏文帝（或谓张华）著有《列异传》。其中的《韩凭夫妇》、《谈生娶妇》、《蒋济亡儿》等，虽也仍着眼于怪异，

但世俗社会的气息已渐转浓重。《韩凭夫妇》故事，《搜神记》有新的创造发展，也为常人熟知，这里暂且不说。《谈生娶妇》写富家的一个鬼女，爱上了四十无妇，常夜读《诗经》的谈生，结为夫妻，生下一子。儿子两岁，谈生违背妻子“勿以火照我”的嘱咐，“盗照视之”，致使鬼女不能复生，因而“大义永离”。鬼女赠珠袍一件别去。谈生“持袍诣市”，王家见袍，初以生为盗墓者，后知实情，乃“以为王婿，表其儿以为侍中”。这是一则冥婚故事，结构完整，情节曲折，中间交织着夫妇情、母子情、父母情，缠绵缱绻，充满着世俗社会的人情味，从中既可见写作技巧的长足进步，也可见世情因素的增长发展。《蒋济亡儿》叙的是：领军蒋济的妻子梦见死去的儿子哭诉在冥间“为泰山伍伯，憔悴困辱”的境况，告诉父母太庙孙阿将为泰山令，要他们买嘱孙阿使其“转得乐处”。蒋济于是厚赂孙阿。孙阿死后，母亲果然梦见儿子说已经做了录事了。这事实乃当时走后门风习的反映，也体现了官僚们的特权，同样充满着人间烟火气，就是今日读来，仍有借鉴的意义。而且故事情节有波有折，描绘人物的心情也颇传神。如写蒋济厚赂孙阿之后，“欲速知其验，从领军门至庙下，十步安一人，以传阿消息。辰时传阿心痛，巳时传阿剧，日中传阿亡。济泣曰：‘虽哀吾儿之不幸，且喜亡者有知。’……”写蒋济的急切心情如绘，活现出他为了死去的儿子能有一个“乐处”，不惜急盼别人死去的自私心态。这两则故事，后来均为干宝选入《搜神记》中。

出于晋干宝之手的《搜神记》中的故事，多见于前此的其他书籍，但许多经过干宝的加工创造。也有些系采访于近世的故事，另一些则取自民间传说。此书不仅能显出志怪小说的发展，在志怪小说史上颇具地位，而且书中一些充满人情味的故事骤见增多，也颇能反映世情题材小说的进化。比如反映媳妇受姑婆虐待而盼望劳作有间的《丁姑》，劝人行孝、以为孝感可以格天的《董永》，特别是反映人鬼爱恋故事的《吴王小女》、《卢充幽婚》等，虽神异色彩依然浓重，但

神鬼的世俗人化现象则比前此的志怪小说更为明显。

《吴王小女》写吴王夫差的小女紫玉与有道术的童子韩重相恋。韩重外出游学，托父母向吴王求婚，吴王不允。紫玉结气身亡。韩重归来，上坟祭吊，紫玉从墓中出来，邀韩重到墓中做了三日夫妇，“临出，（玉）取径寸明珠以送重”。夫差初始以为韩重为盗墓贼，紫玉现身告以实情，然后如烟一样散去。这个故事凄婉绝伦，表现了情之至处生死不隔的动人主题。小说不仅情节曲折，而且其中所引的四言诗，恰到好处地配合着故事的主题，使人更增缠绵悱恻之感，开唐代传奇体小说“以见诗才”的先河。《卢充幽婚》写的是，冥间的崔少府将其亡女嫁给阳间的平民弟子卢充，婚后三日，送充还家。后四年，女又送其子归卢。如果说《吴王小女》是对封建门户婚姻的反抗，那么《卢充幽婚》则是对婚姻冲破门户观念的一种美好的向往。

另有一类，写女子因情而死，死而复活，与情人终成眷属，如《王道平夫妇》，《河间郡男女》等，与所谓冥婚又有不同，怪异的色彩更淡。《河间郡男女》云：

晋武帝世，河间郡有男女私悦，许相配适。寻而男从军，积年不归，女家更欲适之。女不愿行，父母逼之，不得已而去，寻病死。其男戍还，问女所在，其家具说之。乃至冢，欲哭之尽哀，而不胜其情。遂发冢开棺，女即苏活，因负还家。将养数日，平复如初。后夫闻，乃往求之。其人不还，曰：“卿妇已死，天下岂闻死人可复活耶？此天赐我，非卿妇也。”于是相讼。郡县不能决，以谳廷尉。秘书郎王导奏：“以精诚之至，感于天地，故死而更生。此非常事，不得以常礼断之，请还开冢者。”朝廷从其议。

这个故事歌颂了一对普通男女的真挚爱情，既反映了普通老百姓的一种美好愿望，又体现出“常礼”——当时的婚

姻制度——对美好爱情婚姻的扼杀。人们无力改变现状，只好寄希望于虚杳的“天”，盼望有“非常”的事。这让人于美满的结局中体味出一种无可奈何的苦涩。这个故事除了“复活”这一情节露出了些许的怪诞外，与一般的世情短篇已无多大区别了。

到了南北朝的刘宋，志怪小说中的世情因素更见增多。

刘宋初，有陶渊明的《搜神后记》。其中记神助贫民的《白水素女》和人神结合的《袁相根硕》，叙亡女与人结合复生的《马子》、《李仲文女》，都是一些颇具《搜神记》风韵的小说。《白水素女》这则故事，与《董永》性质相近。董永以孝感格天，天帝于是令天女下凡，助其“偿债”。此故事则因谢端“恭谨自守，不履非法”，“夜卧早起，躬耕力作，不舍昼夜”，天帝乃令白水素女为其“守舍炊烹”，且也欲使之“居富”。虽然因为谢端无故窃相窥掩，素女离去，但素女仍留空壳为端贮米谷，使其能够丰衣足食而娶妻、做官。而且，《白水素女》的世俗气、人情味比起《董永》来，则愈见浓厚，且文笔细腻，叙述生动，更可见出一种发展来。《马子》篇叙北海太守之女托梦给马子，言其可依马子复生，当为马子妻，后果得复入人世，与马子结合，生二男一女。《李仲文女》篇与《马子》篇相类，唯女母于仲文处见其女之鞋，疑仲文盗墓，启棺视之，女因此不能复生，与上篇小异，但颇具悲剧气氛，给人的启示尤深。另有一篇《李除》，写李除日中时死去，三更时忽“崛然坐起”，把妻子臂上的金钏捋下，天亮时复活，谓被鬼吏带去，许以金钏，“吏令还，故归取以与吏”。写的虽是冥界之事，但充分反映了世态人情，抨击了人间官吏的贪贿。看得出，此类故事，与《搜神记》中的故事之间的继承与发展。

稍后，有刘义庆撰《幽明录》。《幽明录》中大多数故事未见于旧籍，所写又多晋宋间事，出于义庆首创的可能性很大。而且故事取材多来自现实生活，与《搜神记》的多有旧籍依凭、多源于先代的神话传说迥然有异，较之《搜神记》，

更富有生活气息和人情味，其中的世情因素也更见增长。许多仙凡相通的故事如《刘晨、阮肇》、《黄原》等，描写环境，叙述故事，绘摹情感，历历如画，于幻中见实，于实中寓幻，几难分幻、实，完全是仙境、仙女的世俗化和人化了。其中特别能显出世情因素增长的故事，当数《卖胡粉女子》与《庞阿》。

这两则故事，描叙的完全是一种平民的真挚情爱。前一则写男青年的痴情：托买粉而与所悦女子亲近，终于感动女子，“相许以私”，因为喜极而“欢踊遂死”，及女子“抚之恸哭”，又“豁然更生”，自始至终贯穿一个“情”字。后一则写女青年石氏，因爱悦而魂奔，并且一而再地奔向所爱的人，又誓不他嫁，最终得与所爱成为眷属。死而复生，魂奔所爱，虽离奇古怪，然怪异的气息却很淡很淡。欢踊遂死，或为假死昏厥；思切情系，形诸梦寐，皆现实世界中常有之事。因此，这两篇小说实已是世情短篇了。又如《焦湖庙祝》，写县民杨汤林进入焦湖庙祝的柏枕之中，为黄门郎，娶太尉之女，生六男，历数十年出而只是瞬间，实也是世态炎凉、人生一梦的写照，亦系世俗思想、人间现实的反映。三篇小说对后世的影响也颇大。《卖胡粉女子》被编入《绿窗新话》、《艳异编》、《情史类略》，又有传奇《留鞋记》和杂剧《王月英元夜留鞋记》、《胭脂记》等，小说《百家公案》第六十二回“汴京判就胭脂记”也由此改编。《庞阿》影响到《离婚记》等小说。《焦湖庙祝》则影响到著名的《南柯太守传》、《黄粱梦》、《续黄粱梦》等一系列小说和戏曲。

刘宋之时，复有刘敬叔撰《异苑》。其中也很有些世情因素颇多的篇章，如叙为大妇所嫉，“每以秽事相次役”，后愤激而死，成了能卜未来蚕桑的紫姑神的《紫姑神》篇，与《搜神记》中的《丁姑》是性质相同的短篇，取材于民间传说，似是平民为自己创造的神祇。《异苑》中的《章沉》篇，写死去的章沉因为得到外兄“天曹主者”的“力助”，“断理得免”。一个死去的女子徐秋英见状。“脱金钏一只及臂上杂

宝，托沉与主者，求见救济”，也得免。二人在返回阳世之前成了好事。回到人世后，章沉找到了徐家，二人在人间成了真正的夫妻，且后来生了个儿子名叫“天赐”。如果将“天曹”换成府衙，略去复生等情节，那么这个故事便也完全可视为世情短篇了。

刘宋之后，志怪之书虽累出不穷，然多释证果报之属，迷信转浓，难望《搜神记》、《幽明录》项背，世情的因素亦渐减，唯《八朝穷怪录》中的《萧总》、《刘导》尚需一提。“八朝”者，宋、齐、梁、陈、魏、齐、周、隋也，书之出殆已入隋。

《萧总》本事出自《稽神异苑》，叙萧总游明月峡，遇巫山神女，绸缪一夕。天明，神女赠玉指环一枚，“掩涕而别”。《刘导》篇叙刘导、李士炯同宴，西施、夷光降临，与相好，明感恨而别，西施以宝钿一只赠导，夷光拆裙珠一双赠士炯。把巫山神女与西施写成两个主动荐宿的妓女似的人物，未免唐突褻渎，但文词华丽典雅，情节优美动人，状人写景穷情极态，绮丽缠绵，颇能体现六朝的文风。故事仙鬼之气甚淡，而才子佳人气转浓。溯其源，则与《刘晨、阮肇》相接；寻其流，则开《游仙窟》之先河。

第二节 唐以前辑轶小说中的准世情篇

所谓“辑轶小说”，是指以辑录轶事为主的小说。与志怪小说的志怪异相对，辑轶小说也可说是记人事的小说。辑轶小说所载，或为“前史所遗”，或系史氏为作史所搜集的材料，多为帝王将相、圣贤君子等庶几可以入史之人的遗闻轶事（相对而言的大事），少与平民的日常生活、人事纷扰、感情纠葛等细琐之事相关。故辑轶小说虽写人事，却有许多缺少世情因素。然而辑轶小说到底是记人事的小说，小说中不可能没有世态人情的反映，有些小说集中甚至还出现了一些“准世情”篇章。

汉有《西京杂记》六卷，其中最有名的世情短篇是《秋胡戏妻》和《文君贳酒》。《文君贳酒》叙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相互爱慕，相偕私奔，当垆卖酒，相如患痼疾而死，文君为诀祭之的故事。小说时间的跨度相当大。但作者抓住私奔、贳酒、当垆、作赋、疾死、为诀几件事，突出了相如夫妇的情深意切、风流倜傥。贳酒，显出文君私奔纯为情和才；当垆以耻王孙，显示相如与文君的结合是冲破家庭重重阻挠的结果，突出的依然是个“情”字；作赋、疾死、为诀，仍旧在为“情爱”生色。这里面“私奔”是整则小说的关捩，也是整个故事的开始，作者却一反传统的按时间顺序安排材料的写法，先写贳酒、当垆，说明这对情人私奔后的窘迫、艰难，反衬出他们私奔时不计一切的巨大的勇气；而写私奔，不从细节处着墨，却重写文君的容貌性情，突出了风流多情的主题，不仅使得贳酒、当垆的行为顺理成章，也为故事的发展——作赋、疾死埋下伏笔，的确是颇具匠心。怪不得这则小说对后世的文人和许多文学作品具有那么大的魅力和影响。《秋胡戏妻》说的是：（鲁之）秋胡游宦三年，返回家乡，在离家不远的桑林中遇到一个漂亮的采桑女子，于是用黄金数镒引诱调戏她，女子不为所动。秋胡回到家中，才知道自己在桑林中调戏的女子原来竟是自己的妻子。妻子因之投水而死。小说显然是要谴责地位变化后便忘记了糟糠之妻的背礼行为，这在封建社会具有普遍意义。故事有头有尾，对世风不正进行抨击，充满着世情味。唐代的变文中，便有了“秋胡戏妻”。后来又有很多的“秋胡戏妻”戏曲，正说明了它的撼人力量。

魏晋之时，谈风甚盛。市井之徒聚谈，往往“丑辞嘲弄”^⑩，成为“笑话”。笑话之“话”，非唯话语之意，亦兼含“故事”之义。好的笑话讥讽时弊，抨击人情浇薄，让人于笑谑之中获得启示，往往深刻地反映出世相百态。笑话初时活跃于民间，间或为文人引录。“至魏文因俳说以著笑书”^⑪，开始成为一种文学样式。成书于魏的《笑林》，便是我国最早

的一部笑话集。

《笑林》为魏邯郸淳撰，原书三卷，书已佚。鲁迅《古小说钩沉》辑轶文 29 则。《笑林》中的故事来自民间，从人至事都有极强的虚构色彩，其中确有些能较深反映世态人情的篇什，如：

汉世有人，年老无子，家富，性俭啬，恶衣蔬食；侵晨而起，侵夜而息，营理产业，聚敛无厌，而不敢自用。或人从之求丐者，不得已而入内，取钱十。自堂而出，随步辄减，比至于外，才余半在，闭目授乞者。寻复囑云：“我倾家贍君，慎勿他说，复相效而来。”老人俄死，田宅没官，财货充于内帑矣。

这则故事，虽隶于《笑林》之中，却并不引人笑谑，倒是生活中刻薄、吝啬人物进行了极其冷峻的讽刺，其人物形象鲜明，内心活动的刻画相当深刻。“闭目授乞者”五字，活画出了这个吝啬老人对将要付出的这五个钱的心痛神态。这个人物对后世吝啬形象的塑造，无疑有一定的影响，读一读《儒林外史》中《两根灯草》的故事，想一想《雨花香》中的《铁菱角》故事，便都可以感觉出来。这显然是当时某种世相的反映。

市井之徒聚谈，“丑辞嘲弄”，流为笑话，集为《笑林》之属；士大夫聚谈则谓之清言，集为琐语小说，于是有《语林》、《郭子》。《语林》为晋裴启作，所记主要是汉、魏以来迄于当时的帝王将相以及名士“言语应对之可称者”^①。《郭子》为东晋末人郭澄之所撰，所记亦主要为当时上层社会人物的言语应对。两书中极为精彩的世情篇章，几乎都被收入《世说新语》一书中。可以说，唐以前的志怪小说至晋已达高峰，出现了像《搜神记》这样的集大成之作，而轶事小说的高峰，至南北朝时的刘宋方始形成，《世说新语》为其标志。

《世说新语》为临川王刘义庆所作。书以大量的篇幅记载

了魏晋时士人的言行举止，这些言行举止在今天看来，有些相当奇特。书中也叙写了当时统治阶级中一批贵族腐朽、荒淫、奢侈的生活和残忍的行径。鲁迅说它“记言则玄远冷峻，记行则高简瑰奇”^④。其中许多篇章都脍炙人口，影响深远，后世仿作不绝，至有“世说体”一说。

《世说新语》中的“贤媛”门则写了许多妇女的高贵品质，如陶侃母亲割发市米、斫柱为薪、锉荐喂马，以待子友；王浑母亲善于体察人，知其虽才而不寿，等等，都很感人。其中《许允丑妇阮氏》一则，写人物的心态，可谓历历如绘：作品先是写许允知所娶为丑女，不肯进房，经桓范相劝，入而“察之”。之所以入察，大约还怀着一种侥幸，自然，也许是试着看能否忍受；一入“即欲出”，显然是最后一点希冀破灭。新郎不入新房，家人皆深以为忧，而阮氏却不急。不急并非不忧，知有客来即“令婢视之”，是“忧”的表现。知客是桓范，便料定他必劝许允入房。当许允才入“即欲复出”，她知道关键时候到了，若让新郎离开新房，便真的再“无复入理”，于是抛开了新妇的羞涩，“捉裾停之”。许允不顾颜面，发出了“妇有四德，卿有其几”的责问。故事情节达到了高潮，弦绷得紧极。阮氏充满自信地回答许允的责问，勇敢地责备新郎“好色不好德”。尔后情节突然急转直下，在新妇的责备下，许允面“有惭色，遂相敬重”。小说充分地反映了阮氏的聪明、冷静和才辩。在表现阮氏机敏、自信的同时，也反映了当时好色不好德的风气。

又“贤媛”中有一则故事，无论是小说研究者还是伦理学者都不曾加以注意：

周浚作安东时，行猎，值暴雨，过汝南李氏。李氏富足，而男子不在。有女名络秀，闻外有贵人，与一婢于内宰猪羊，作数十人饮食，事事精办，不闻有人声。密覘之，独见一女子，状貌非常，浚因求为妾。父兄不许。络秀曰：“门户殄瘁，何惜一女！若连姻贵族，将来

或大益。”父兄从之。遂生伯仁兄弟。络秀语伯仁等：“我所以屈节为汝家作妾，门户计耳。汝若不与吾家作亲亲者，吾亦不惜余年！”伯仁等悉从命。由此李氏在世，得方幅齿遇。

络秀确是个精明强干的女子：“与一婢于内宰猪羊，作数十人饮食，事事精办，不闻有人声。”精明中却透出势利：她之所以在内忙碌，乃是因为“闻外有贵人”；她之所以劝说父母让自己作周浚的小妾，不是因为爱，只是因为考虑到娘家虽富足而“门户殄瘁”，“若连姻贵族，将来或大益”。到了周家，生了儿子，仍然未忘记自己作妾的目的是为“门户计”，疾言厉色地告诫儿子：“汝若不与吾家作亲亲者，吾亦不惜余年！”这是一个为了改变娘家地位而作出了莫大牺牲的女性，作者之所以把她列入“贤媛”门，予以赞扬，大约便是因了这一点。在今天看来这实在是个不值得赞扬的人，但小说在客观上却说明当时门第观念强烈，反映出了当时的一种世态人情。

《世说新语》中也有一些描写男女婚恋的小说。写男女恋情最为出色的小说大约要数“假谲”门中的《温峤娶妇》。《温峤娶妇》写温峤死了妻子，私下里看上了表妹，又不好明说。恰好姑姑托他为表妹介绍对象，于是他使用自己的一面玉镜台为聘礼，骗姑姑说已经为表妹找到了一门好亲事，男方的声名地位都不比自己差。姑姑听了自然十分高兴。但表妹却看破了他这位表哥的鬼心事，大约也爱上了温峤，所以也没说破。到成婚那一日，温峤将表妹迎到家中，新娘子手披纱扇一看，果然不出所料，丈夫就是表哥，忍不住拍手笑了起来。这是一篇十分有趣的婚恋小说。温峤爱表妹，小说中写了一句“公密有自婚意”；表妹爱温峤，小说并未明写，但人们从字里行间却完全看得出、体味得到他们早已心心相印。作者写他们成亲时表妹“以手披纱扇，抚掌大笑，曰：‘我故疑是老奴，果如所卜’”，便把这种心心相印活画了出

来。那种假中藏真、半隐半露的对话，充满了喜剧效果。这段风流佳话，在元代，关汉卿就曾拿来作成杂剧《温太真玉镜台》，到明代，朱鼎又写成了《玉镜台》传奇。

“惑溺”门中，有一篇《贾充女私韩寿》，也是一篇客观上歌颂了男女爱情的很不错的小说。这篇小说从贾女于青琐中见到韩寿，因而萌生爱慕，写到婢女了解女主人的心意，往韩寿家述说。韩寿请婢女潜修音问，私下好合。再写到贾充怀疑，拷问婢女，终于发现他们的秘密，让他们成婚，情节十分完整，结构也相当紧凑。小说虽也列入“惑溺”门，可见作者对贾充女之私韩寿事的微词，而结尾叙“充秘之，以女妻寿”，也显示出一种家丑不可外扬的无可奈何情绪。但贾充毕竟较为开明，促成了女儿的婚事，使有情人成了眷属。而这样的叙男女由爱恋、私合到成婚的情节，前此的小说中除《文君贳酒》等少数篇什外，一般只能在志怪中的人鬼、人神爱恋小说中才能见到。小说写贾充女的心态相当生动：先是“恒怀存想”，“想”到了“发于吟咏”的地步；与人私合后，则“盛自拂拭”，心思完全流于行动，终于暴露秘密。这篇小说对唐人传奇及后世的才子佳人小说等的影响极其深远。其情节的构筑，很明显地为元稹《莺莺传》所吸取，后来的才子佳人小说也多所采用。它可以是唐以前写男女婚恋小说的典范之作。小说的本事在前面所讲到的《郭子》之中，只是《郭子》中的这则故事并未完全定型：先谓贾充之女与韩寿通，复又辩曰：通寿者为陈骞之女，陈知之，以妻寿；未及婚，而女亡，寿复娶贾充女。

此外，《世说新语》中反映择交重操守的《管宁割席》，择婿任自然的《郗太傅东床》，以及写王戎俭吝，等等，都是很不错的“准世情篇”。

更有一点需提及的是，《世说新语》往往把同一人、同一性质类型的几则故事放在一起，如叙王戎四则集中表现了王戎的俭吝，叙许允丑妇三则集中反映阮氏才智过人，有关陶侃母两则叙陶母的贤惠等等，这对于表现人物自能起着一种

相互补充的作用，而且，给后人联缀短篇以成中篇小说以启示。说《世说新语》为唐以前世情小说孕育成形的标志，大约不会有错。

从世情小说的角度说，还有一本《妒记》，也很值得一提。

《妒记》二卷，虞通之撰，已佚。从现存的一些佚文看，这部《妒记》大约是我国第一部以夫妇关系为题材的小说集。其中有些作品描写的是一些心理变态的妇女，即所谓“妒狂”，像《旬氏妇》，写庾氏因为妒忌，杀了自己的两个儿子；出于妒忌，无须的人不准入门；丈夫与自己的兄弟同睡，以为有外遇，兄弟险些被杀害，实在并无多少意义，也很难说是对不合理婚制的仇恨或抗争。但有些篇章，如《王丞相》，表面上虽写曹夫人妒忌成性，侦知丈夫别馆藏娇，便带领婢仆持刀出去寻找；而实际上写的是她丈夫王丞相在外“密营别馆”，“众妾罗列”，“儿女成行”，客观上明显地反映了不合理婚姻制度下的夫妇不和谐关系及不协和的家庭生活，表现了一个颇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另外，《妒记》中还有一则，写一个妒妇经常虐待丈夫。丈夫让巫师称说自己变成了一头羊，只有妒妇不妒，才能复还人形。妇“自咎悔誓”，“媢徐徐还”。尔后妇一萌故态，媢便伏地作羊鸣。慢慢地妇“不复妒忌”了。这小说中的“妒妇”其实是一个对丈夫爱得颇深的女人，作者在作着一种并无太大恶意的调谑。读了这小说和这小说集，很能让人想起后世许多写妒妇的世情小说，尤其容易令人联想到《醒世姻缘传》中薛素姐虐待狄希陈的情节。

第三节 世情小说的萌生：

反映“世俗态”中人生的唐五代传奇

虽说在唐以前的漫长岁月中，以表现人间男女恋情，叙述家庭生活为主的具有世情因素的小说不少，甚或准世情小说也屡有所作，但与其他志怪和轶事小说相比，我们却又不

能不说是薄弱、幼稚。为什么生活中天天能够感知的事，作为生活反映的小说，却较少去反映？这当中的原因很复杂，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是，这种充满人性味的小说，需要有适合人性较为自由发展的土壤。唐以前的社会，不要说经济的发展还没有达到足以产生这种土壤的程度，那种世族地主统治的政治，也不允许有人性自由发展的情况存在。经过了隋末农民起义的冲击，世族地主的统治受到了巨大的打击。唐统治者注意从庶族地主中选拔人才，世族地主垄断政治的局面被打破。一统的唐王朝又实行了较为开明的政策，经过了唐前期的休养生息，经济终于空前地繁荣起来。尤其是工商业的繁荣，带来了城市的发展和市民队伍的壮大，这为人性较为自由的发展提供了虽还相当贫瘠，却毕竟已经出现的土壤。于是，随着小说观念的质变，小说本身发展的飞跃，写人间恋情、写家庭生活的小说，也更多了起来。世情小说正式萌生了。

一 唐前期的世情小说（唐初——天宝）

初唐的第一篇世情小说是《游仙窟》。它是由六朝具有世情因素的志怪小说转化成世情小说的第一篇作品。作者张鷟（约 658—730），字文成，自号浮休子，深州陆泽（今河北深县）人。上元二年（675）登进士第，历岐王府参军、鸿胪丞、襄乐县尉、长安尉、监察御史等职，终司门员外郎。文名颇著，时人目为“青钱学士”^⑨，且盛传至新罗、日本等国。性躁浮，复好攻人过，为权臣姚崇所恶，御史李全劾之，贬官岭南。《游仙窟》之外，尚著有《朝野金载》等。

《游仙窟》系张鷟早期的作品^⑩，它以第一人称叙事，写“余”奉使河源，入一“神仙窟”中，与五嫂、十娘宴饮调谑，诗赋赠答，为十娘留宿，天明离去。情节十分简单，但文近骈俪，铺陈华艳，颇与六朝绮丽文风相掎。作品中的“余”，颇似妓院的嫖客，而十娘分明是妓女，五嫂则为鸨儿。小说所写，实际是一个浪荡文人的一次放荡的狎妓活动。小

说开头的描写，颇与六朝的遇仙小说相似。但后面的叙述，可就远离不食人间烟火的仙界了，全没了六朝遇仙小说如《刘晨、阮肇》、《袁相、根硕》等那种美好浪漫的仙气，倒是恶性膨胀了《八朝穷怪录》中《萧总》、《刘导》两篇（尤其是后者）对仙子褻渎、唐突的轻浮，显出它的浅俗。而且，小说绘景绘情，描摹物态，细腻生动，对文人狎妓放荡生活的叙写大胆、真率、自然。从世情小说的角度而言，这意蕴的浅俗和描写的细腻，又分明透出一种发展来。

唐前期，还有一篇《吴保安》很值得重视。《吴保安》出自牛肃《纪闻》。如果说《游仙窟》是由六朝具有世情因素的志怪小说发展而成的世情小说，那么《吴保安》便是由六朝辑轶小说进化而成的世情小说。它由若干相联系的事情组成：吴保安求职，郭仲翔荐职；郭因军没，身陷蛮中，故而求赎；吴倾其家资，不顾妻子，外出经营 10 年不归，得杨安居之助，将郭赎归；吴故去，郭为厚葬，行服三年，为其子娶妻，让朱绂及官与之，反映出吴、郭二人之间高尚诚挚的乡谊、恩情、道义。小说在歌颂的同时，实亦有对浇薄人情的谴责隐藏在其中。它借鉴纪传体的范式写人，唯以真为务，给人一种强烈的道德震撼力。而为文又特重辞藻，有异于史传，是文章家与史家的结合。小说从内容到形式都见出了世情小说的渐趋成熟。明代人曾将其改写成拟市人小说《吴保安弃家赎友》，并编为传奇《埋剑记》。

二 唐中期的世情小说（唐肃宗至德——唐宣宗大中）

唐代中期以前的世情小说，还处在一个转化的阶段。这从上面所讲到的《游仙窟》和《吴保安》可以看出。

经历过安史之乱以后，国家又安定下来，出现了所谓的中兴局面。而实际上，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明显削弱，形成了藩镇割据局面。虚假的经济繁荣，又造成了统治阶级包括一批文士、商人的绮靡奢侈，放荡恣肆，原有的道德观念也出